

# 科举与南京

周道祥 张蕾 编著

南京出版社



D691.3/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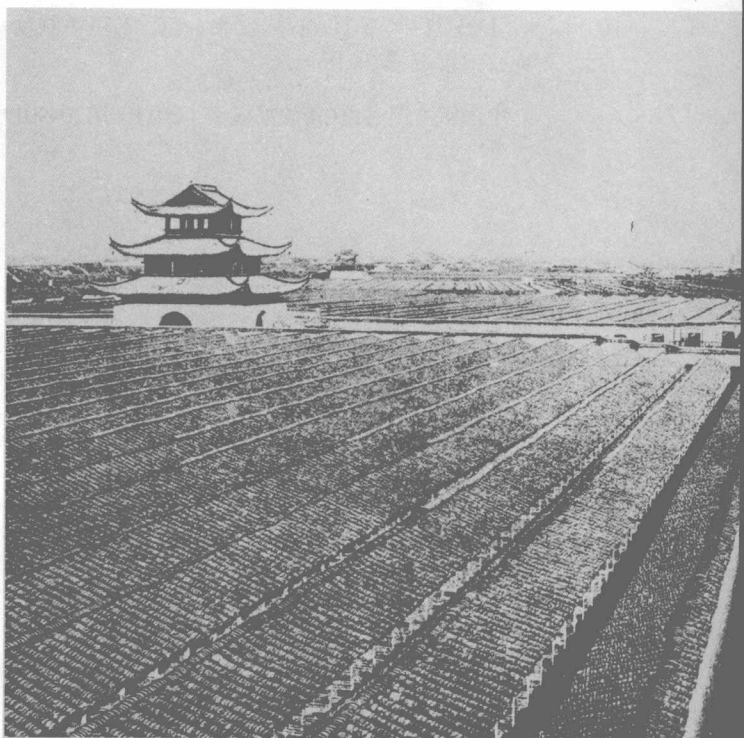
南京市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立项课题成果

1) 691.3/60

1954405

周道祥 张 蕾 编著

# 科举与南京



4405

江苏师大图书馆

徐州师范大学图书馆



23966386

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科举与南京 / 周道祥, 张蕾编著. —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80718-833-9

I. ①科… II. ①周… ②张… III. ①科举制度—研究—南京市 IV. ①D6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04901号

书 名: 科举与南京

编 著 者: 周道祥 张 蕾

出 版: 南京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成贤街43号3号楼

网址: <http://www.njpbs.com>

联系电话: 025-83283883 (编务)

邮编: 210018

电子信箱: [njpbs1988@163.com](mailto:njpbs1988@163.com)

出 版 人: 朱同芳

责任编辑: 鲍咏梅

装帧设计: 周 勇

责任印制: 杨福彬

制 版: 南京新华丰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凯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毫米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268千字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18-833-9

定 价: 48.00元

南京版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 序一

朱善璐

—

通过考试选拔任用行政官员的制度今天已经广为普及，但或许很少有人知道考试制度的发源地在中国，考试是中国的一大发明。世界范围内，中国考试历史最为悠久。中国考试史上最为重要的是科举考试。科举考试是中国古代制度文化中最具世界影响的一项制度。

概言之，作为中国古代人文活动重要内容的科举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分科考选文、武官吏后备人员的一种选官制度。自西周以后，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经历了一个从重德到重才、主观向客观、封闭向开放、贵族化向平民化演变的发展过程。就历代仕进的方式和途径而言，举其要者有夏商周时期以血统或世袭身份获取功名的“世卿世禄制”，以及或以门第、或以德行、或以才能为重的战国的“养士军功制”、两汉的“察举”与“征辟”、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和隋唐以后的“科举制”。隋以前实行的种种选仕制度虽立意美妙，然而在以家族宗法制为传统社会结构及重人情、关系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最终都被异化为结党营私、任人唯亲的工具。由于制度的不完善，阶级上、下层之间矛盾尖锐，政治的稳定受到影响，豪门世族把持着入仕之途，致使地方割据势力削弱了中央集权。隋朝开创的科举制度，采用相对稳定的考试办法合理化培养与选拔人才，既保证了选任人才维持较高的文化素质，又排除了人情关系对官员任用的困扰。科举制度是我国官员选拔制度上的进步阶段，从此中国选官史打开了新的一页。

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设置进士科算起，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发布上谕停罢科举止，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整整延续了



001

1300年之久。今天看来，以考试方法录用官员是极为平常的事情，但是古人发明、创立这一制度的过程却相当漫长，并非那么简单。从选拔录用官员时有意识地使用考试办法到考试录用制度正式确立，大约经历了700多年。这个时间不算短暂。科举制度的进步性、合理性是在其逐步实施过程中不断完善进而显现的。应当指出的是，并不是任何国家都能创设科举制度。据考证，古代埃及、罗马、希腊等国都没有考试制度，只有中国独树一帜。能够创造出这样一种制度的国家，至少要具备相当的文明程度，否则用考试选人就没有实际意义；同时统治者还必须十分重视选人用人，且这种重视具有世代代的连续性。科举制度的产生发展，正是历代统治者和政治家们不断探索和总结经验的结果。

科举制度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唐宋600余年间，科举制度伴随封建社会的鼎盛发展成为一种成熟而完备的选官制度和文化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唐宋以后，科举考试成为人文教育活动的首要内容。明清时期，科举发展得相当完备，政府对科举的推崇达到极致，社会对科举的重视也几近于顶礼膜拜的地步。

综观科举制产生的背景及运行过程，首先应当肯定的是其在中国历史上所承负的整合传统社会、凝聚社会阶层、维系社会内部文化生态平衡的调节作用。科举制度下，阶级上下层级之间的流动，使文化知识教育的覆盖面远远高于以身份等级为基础的封闭社会。通过科举制度，历代统治者不断从包括平民在内的各阶层中获得新鲜血液，吸纳知识能力上更具有竞争力的优秀分子为统治政权服务。统治阶层中的部分成员则在同一社会循环中不断去故纳新，官吏队伍良性循环，选拔与退免互为制衡，国家机构的运转效能从而得以提高。

科举制在选拔官员过程中所遵循的“平等竞争，择优入仕”的原则是一大创举。科举重平等，秉公正，几乎给每一个下层优秀人才流往上层社会阶层提供了可以进入仕途的均等机会。从形式上说，统一全国的考试内容、方法和标准，使应试者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统治者实行科举力求公正，士人更重视知识标准和公正原则。应考者不论出身与地位，除倡优等少数人外，任何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攻读生涯、通过科举考试提供的“金榜题名”的相对平等机会进入统治阶层。唐宋时形成的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考试体系以及自北宋开始各王朝所建立的糊名制、回避制、复试制、锁院制等各种考规都是针对官







003

僚特权而设的，体现了平等、择优的原则。在等级森严的封建时代，能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虽然科举考试制度产生于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社会，但其基于平等精神的公平竞争、学优即可入仕的精神却具有超越封建时代的特性，是中国封建社会难得的较为公平的制度。

科举制度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造就并形成了中华民族特定的政治文化心理与价值。科举营造出的极端重视教育的民族传统、刻苦勤奋读书的氛围，对中国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科举使传统中国人重视教育。科举制度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以科举为核心的教育制度与人才选拔制度，既是相互依存的纽带关系，也是维系社会各阶层对君主、儒家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威效忠的基础。科举吸引中国封建社会的广大知识分子十年寒窗苦读，希望一举成名天下知，而不是怨愤满腹、聚众滋事。通过科举制择优选出的各类官员，是中国封建政治体系中文化素质最高的群体。从时至今日高考第一名仍被称为“状元”并受社会广泛推崇来看，科举制度作为一种文化积淀已经根植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

自科举制度创立以来，人们对其功过是非便聚讼纷纭，毁誉不一。西方学者赞誉：“如果说在中国政体中还有什么特别之处会受到欧洲人无条件的赞美的话，那么便是科举制”；“科举是人类所发展出的选择公仆的方法中最奇特、最令人赞赏的方法”。批判者却认为科举束缚了人的聪明才智，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八股之害，等于焚书”。古今所有制度中，科举制度可以说是评价差异最大的一种制度。

尽管对科举制度的评价有着如此强烈的反差，但不可否认的是科举制度的产生，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创举。科举制度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隋以前曾经实行过选官制度，后来都被科举制度所取代，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它比以往的制度要合理得多。科举制度的兴起绝非偶然，它是对以往人才选拔制度的一大改革。就其对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思想、教育、社会心理乃至风俗等各方面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而言，史上很少有哪一种制度可以与之比拟。

## 二

千百年科举制度的实行，对南京城市文明的影响是极为深刻而显现的。

南京历史悠久，文化璀璨。作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南京的东郊汤山早在30万年前便已有古人类聚居活动的踪迹。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命范蠡筑越城，拉开南京2500年建城史序幕。229年，东吴孙权据此建国立都，为南京都城史挥洒下第一笔。继其后，东晋、宋、齐、梁、陈相继定都南京，“六朝文化”成为中国历史文化最辉煌的篇章，南京也从此成为正统中华文化的中心。五代十国时，南唐光辉灿烂的文学艺术成就，对后世影响深远。明初，朱元璋通过武力统一中国，定都南京，南京历史文化空前繁荣，领掌全国。入清后，南京作为清王朝的财赋重镇，历史文化仍得以顽强传承并一再发展。太平天国在南京推行迥异于清王朝的文化制度，体现出与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思想理念。民国时期，南京成为近代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和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民国文化融中西文化精粹，别具特色。十朝都会，是南京最辉煌的历史。吴宫花草、晋代衣冠、南朝寺舍、明祖殿堂、天国烽火以及民国兴衰，南京地域文化极富鲜明时代个性。

城市文明缓慢演进的两千余年中，各种文化的不断碰撞、融合，为南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科举制度文化的影响和积淀尤其深厚。六朝时，南京虽为南方偏安国家的都城，但“六朝金粉之地”文化上却在全国处于强势地位。在制度文化方面，科举制度萌芽于南朝，南朝的萧梁开五馆、设明经科，从制度上为寒门庶人入仕开辟了一条绿色通道。萧梁科举萌芽断续到隋唐时发展完备，伴随着中华文明，延续了千年。明王朝建立，取得了许多独步天下的文化成就，也造就了科举巅峰时代。明代开始以八股文取士，读圣贤书、写八股文、走科举路成为士子获得社会地位和财富的唯一道路。八股文写作的好坏，往往决定了一个考生的命运。八股文的行文、格式虽有严格的限制，但也被视为统一的标准，不失公平。明代，科举已被人们视为天下最公平的一种制度，因而有“科举，天下之公”、“科举而私，何事为公”之说。南京明王宫殿内，明太祖一声令下便将其“治本于心”的政治用心顺利实施，于是乎，全国数以万计的士子开始摇头晃脑研习八股，只为出人头地。八股科举在明清两代对读书人产生巨大的导向作用，以后几百年整个社会弥漫的全是科举的气息。

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形象的确立，与科举文化在南京的丰厚遗存不无关系。历史上，南京是人才聚集之地和科举考试中心，至今科



举制度文化的影响和积淀在南京的许多地名中仍清晰可见。据统计，南京受科举影响的地名有三十余处。因为南京当时是考试中心，很多考场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比如贡院街、上江考棚、下江考棚，演武厅、武学堂。与科考等级直接相关的地名有朱状元巷、沈举人巷、三元巷等。此外，夫子庙、文德桥、四牌楼、三牌楼、成贤街、学堂巷、科巷等，也都与科举制度有关联。这些与科举有关的老地名，记录了南京科举文化的历史。科举文化广泛、深远的影响，也从这些文化遗存中得到反映。

人文景观展现了旧南京源远流长的人文传统。中国古代最大的科举考场——江南贡院，作为中国科举制度的载体，至今仍屹立于南京秦淮河畔。它不仅是中国封建科举制度的千年化石和兴盛成败的历史见证，也是科举制度文明的有形遗产在南京最直观的体现。

科举取士，在国家为求人才，而在个人则为求入仕。数百年来，无数风流人物纷至沓来，唐寅、郑板桥、秦大士、张謇等人曾在南京中举；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曾在南京主持考务；吴承恩、吴敬梓等人也曾在南京寻求功名，虽不幸落第，但却在其他方面成就了业绩。明清两代，经济发达且文化水准较高的南京，由科举考试脱颖而出者人数在全国名列前茅。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南京文化源远流长。千余年科举制度文明及其对南京的深远影响，造就了南京独特的历史文化气质、优良的文化传统和具有突出的导向性地域文化，也塑造了南京特殊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科举文化保持并打造了南京的特色，南京堪称中国科举文化之城。

### 三

科举制度既有其兴盛时的辉煌，也有衰败时的悲哀。甲午战争后，在中国一系列的战败与退让下，人们愈加将国家的积贫积弱归咎于儒家思想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传统文化基础之一的科举制有其与生俱来的种种弊端，尤其是明清之际八股取士，科场腐败等愈发明显，因而成为人们抨击的对象，对其进行改革的呼声日重。变法维新期间，改良派通过光绪帝发布“废八股，改试策论”的诏书，却在“戊戌政变”时未功夭折。1900年“庚子之乱”后，清政府在内逼外迫的局势



005



下，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清末新政”，从政治、经济到教育各个领域都进行了变革，科举制度的改革也在其中，最终被彻底废止。1905年，清廷下诏“废八股，废武科”。科举千百年，存改停废竟只在朝夕。

从清末废除科举到现在，又一百多年过去了，科举在许多人的印象里，仍不堪回首。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就在国人抨击科举、科举制走向穷途末路的明清时期，西方人却经由在华传教士的介绍而惊叹科举制的奥妙和优越，并借鉴科举建立了西方现代文官考试制度。有西方学者甚至认为科举制传入欧美并影响世界，是中国在精神文明领域对世界最大贡献之一，其意义足以同物质文明领域中的火药、印刷术等四大发明相媲美，科举制可称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以往已有人将汉字、中医的经络理论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但这些并未被世界普遍采信。将科举制与四大发明相比的首先是西方人。总体上说西方学者对科举制的评价，要比中国人的评价高得多。且历史上，韩国（朝鲜）、日本、越南还曾模仿中国实行过科举制，这是不争的事实。

#### 四

文化之河犹如一个民族的血脉。古往今来，世界任何民族生生不息的真正不竭动力就是其独特的文化。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断源绝流，那么这个民族也就销声匿迹了。

科举作为中国封建时代最重要、影响最为深远的考试制度与选拔人才的一种独特方式，连同产生它的土壤封建社会一样，已经退出历史百年，一去不再复返。但在历史进程的浪潮中，科举制度曾深刻地塑造过中国社会文化的形态和知识分子的形象，并对人类文明进程作出过重要贡献，科举所包含的内在精神和文化意蕴并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失去价值。科举意识已经深入千家万户，科举文化已经根深蒂固地渗透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科举正以潜在的方式，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持续作用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意识、精神等层面，发挥着塑造民族精神的作用。

科举的影响既广且远，这份丰厚的遗产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还超出中国远播海外，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着极大的作用。科举考试制度在今天选拔官员时仍是具有借鉴意义的一种制度。



现代各类考试的原则与方法都明显与科举考试有渊源继承关系。中国现代的公务员考核录用制度脱胎于科举；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人事制度改革中通过考试或竞争上岗来选拔人才的重要举措也得益于科举。

科举的现实意义是传承文化，传承文明。科举文化对现代中国还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科举制度尤其对中国的教育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新中国的高考制度，与科举制度有某种惊人的相似。三十多年来，高考为国家建设选拔了数以百万计的人才。虽然我们不可否认，高考制度自身存在的局限性。例如近年来中小学教育倾重于应试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许多人就将造成这一问题的罪祸归咎于高考制度，甚至有人提出要取消高考制度。

一项考试制度或甄选制度的权威很大程度来自于对所有考生的公平、公正。任何一种考试制度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我们不要对古代的科举制度求全责备，也不要对现行的高考制度品头论足。我们有必要站在历史的、发展的高度，用全面、客观的视角，对选拔封建官僚的科举制度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审视和考察，而不是简单地予以价值的肯定或否定，这无助于我们对其科学的认知。

科举文化是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现象，在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虽然从兴科举到现在已上千年，废除也有百年之久，但科举跟时代并没有脱节。古为今用，历史往往有惊人相似。科举虽已废止，但考试这种选才方式却没有也不可能停止，仍适用于现代社会。而千年科举考试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深刻教训，对当今的各种考试改革皆有参考价值，对选拔人才和教育制度等仍有着深刻的持久的影响。重视科举文化的研究，保护和利用好这一文化遗存，光大和继承传统文化的优秀成份，是建设和谐小康社会的需要，也是南京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2011年2月12日

（作者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现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



007

## 序二

蒋赞初



009

我国的科举制度源远流长，它渊源于汉，起始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定型于明，而止于清末，1300年间经历了多个朝代的更迭。尽管各个朝代曾有不少官员和学者批评科举，甚至有的皇帝还曾下令停罢科举，但科举总是旋罢旋复而仍然长期延续。科举制度为什么能够在我国长期存在？其所以能绵延千余年之久，自有其深刻的政治和社会的根源。

科举制的产生有赖于多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在人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文化认同上的巨大优势。从汉代开始，特别是隋唐至明清的封建中央集权制之下的以儒学为主流文化的国家是科举制赖以生存的土壤。而科举制也为维护、巩固和发展封建中央集权制在思想、文化和官僚机构的组成上作出了它历史性的贡献，二者互为依存，这正是我国科举制延续千余年而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科举制度的实行，是我国选官制度发展的巨大进步。在封建社会时期，历代统治者在选拔人才时都会遇到两难的选择，即“德”与“才”的抉择。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各种各样的选才标准——或以血统、或以军功、或以资财、或以德行、或以才干等等。但是，从发展趋势看，最终皆倾向于德才兼备。科举制表面上看起来纯粹是以才学取人，而实际上德行也作为重要的参照因素。需要指出的是，参加科举的应试者所要具备的“德行”，必须符合于当时封建统治者所规定的德行标准，是有其特定的时代内涵的。科举制对应试者所属的阶层有着一定的限制，即娼、优、隶皂，以及被认为是罪户的子弟，均不得参加。换言之，只有封建统治者认为符合他们所认定的德行条件的

人才准予应试。科举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解决了德才兼备的矛盾，原则上使每一个录取者同时符合德与才的双重标准，这是科举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一大创举和重要贡献。

科举制度自隋代确立起即确定了公开招考和自主应试的原则，它的及第标准是一切以考卷的成绩为去留，在成绩面前人人平等。由于科举制度的这种基本上的平等性和公平竞争的精神，使得当时社会下层的读书人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社会的上层，而上层的世族子弟也会在朝代的不断更迭中，由于本人的无才和无德而沦为平民。这种上下交替的变动，也带动了不同社会阶层间的流动，有利于扩大封建统治的基础，有利于官僚结构的不断更新，从而使社会保持一定程度的活力和生机，因而使得科举制度本身得以历经千余年而不衰。当然，这种平等性和公平竞争的精神是有局限性的，它往往受到皇权与上层官僚贵族们的约束。

在科举制度的施行与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当完备的考试体系。如科场有规制，命题与评卷有繁杂而严密的程序，惩罚作弊有措施，还实行了回避制度，采取弥封、誊录和糊名等方法。多数朝代还对主考官和在朝官员的子弟作了一些限制，使平民子弟得到较为公平的竞争环境，这一切都是为了使考试成绩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应试者的水平。相对于前期封建社会中的选拔制度而言，这种以文化知识为考试内容的做法，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科举制的核心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社会经过长期摸索、探求后取得的结果。它在选拔人才方面要比以往的任何选官方式都显得更为公允。科举制采取了多层次的考试，不仅对于保证选取人才的可靠性、正确性与客观性起着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任人唯亲”的用人路线也有着相当的抑制作用。科举考试造就了我我国封建社会的文官政治，使选拔官吏有了一个比较客观的标准。科举制在总体上提高了官员的素质，也使官员的任用有了一种比较合理的制度形式。通过科举选拔了大量优秀的人才，而且科举出身的官员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能够依据当时的封建法令来施政。科举制能够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存在千余年之久，并能经久不衰地动员士民积极参与，显示出了它具有生命力的一面。



科举制通过考试把读书与做官联系起来，使历代的知识分子从此致力于经、史和文学等文化知识的研究，使他们梦寐以求的“学而优则仕”的理想变为现实。这种“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曾经造就了千余年来无数中国文人的独特命运。

## 二

作为一种才学能力的测试，科举考试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在古代政治、社会、经济与思想生活之间互动最为频繁的交汇点之一。在当时人们的传统思维中，衡量一个地方文化兴盛与否，往往与该地区科举出身的人才的多少密不可分。

科举制度从全国范围来说，虽然是始于隋末而盛于唐宋明清，但就南京（金陵地区）的具体情况来看，则只能从南唐起始。由于六朝的衰亡，我国的政治中心北移，而隋唐统治者的政策是贬低金陵，提升江都（唐代起称扬州）和润州（今镇江）的地位，使之作为长江下游两岸的政治重镇。金陵则被降为县一级的编制，受润州管辖，在科举方面，只能听命于润州刺史，派遣为数甚少的官学生或双乡贡生赴长安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故唐代金陵的士子考中进士者不多。

南唐仿照唐代的科举制度，在建都金陵期间（937—975年），设置国子监于秦淮河畔，并开科举士。南唐先后举行过17次由礼部主持的科举考试，共录取进士数百名，从而为后来的北京政权培养了一批人材。北宋时金陵虽由国都改为江宁府，但由于其经济、文化和军事地位的重要性，江宁知府常由重臣担任，如包拯和王安石等。宋仁宗赵祯作为皇子时，亦曾受封为昇王兼江宁府尹。因此，江宁士子被选拔至汴京参加科举考试者也显著增多。至南宋时期，金陵为抗金重镇且被定为行都，建有皇帝的行宫。在南宋一代的科举考试中，建康府的士子成进士者达百人左右。元代政权虽然轻视汉族士人，但仍维持了南宋时金陵的教育设施，如将建康府学改称集庆路学，在孔庙前树立“封至圣夫人碑”与“封四氏（颜回、曹参、孔伋、孟轲）碑”等，并续办南宋时府城内的明道书院和南轩书院，以及城外湖熟镇的昭明书院，还支持了新办的江东书院。在官制中，还设有江东道儒学提举司。但是，据有关地方志记载，集庆路的士子在江浙各乡试中虽然录取者不少，而在会试中却下第者



011



颇多，殿试后成为进士者仅两名。

南京历史上有多少才子荣登“状元及第”的荣誉顶峰？据史料记载，上迄南唐，下至清光绪三十年罢科举，南京的文武状元共有19位。在众多才子之中甚至还有一位女状元，即太平天国时期的金陵女子傅善祥。文武状元们名彪史册，至今南京城内还遗留着以状元冠名的街巷地名，如夫子庙附近的状元境、鼓楼附近的焦状元巷、水西门附近的朱状元巷与黄状元巷以及新街口附近的三元巷等等。

科举考试在明清时期经历了曲折的兴衰演变，其功能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从明清时期南京的政治、社会、教育以及文风等方面的表现中均有所显示。

自元朝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率军攻入集庆城（即南宋的建康府城），改集庆路为应天府起，经历了兴建应天府城、正式建立为明王朝的都城以及“靖难之变”等历史事件，直到永乐十八年（1420年）朱棣迁都北京为止，明初三代帝王在南京苦心经营了65年，南京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当时京师南京的城市规模和社会经济的繁华程度，以及思想领域的先导性均超越了全国范围内的其他任何都市，更超越了以往的各代。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因“官多阙员”，诏令举行科举，并举办国学，正式规定科举考试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每三年举行一次，其中会试和殿试集中在南京举行。明初三代在永乐迁都之前在南京实际举行过11次会试、12次殿试。就目前所知的资料显示，12次殿试除3次未见录取进士名额外，其他9次共录取进士1309人，其中南京籍进士有19人。

永乐迁都北京以后，南京是两京制度下的陪都，或称“南都”、“留都”，一切中央机构如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与五军都督府均仍然基本保留，仍然是南方以至全国的政治和经济的重地。而南京的文化、艺术、民俗、商贸、建筑等诸多方面均受到科举文化的影响。例如明代晚期时南京进士顾起元在其所著《客座赘语》一书中，借一长者的口吻说道：“正（德）、嘉（靖）以前，南都风尚最为醇厚。荐绅以文章、政事、行谊、气节为常，求田问舍之事少，而营声利、畜伎乐者，百不一二见之。”这说明当时南京的社会风尚敦厚，崇尚俭朴，在此风气影响下士民唯以读书、授徒为业，以科举进仕为常。





013

从明代起，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在全国范围内成为唯一的科举考试课程并首次延伸到县一级。洪武初年的首次乡试和会试中，科举考试的内容就是以四书五经为基础的经学文章，而唐宋以来一直强调的诗赋就不再测试。当然，科举教育的前提是建立在区分社会阶层的基础之上，依士、农、工、商的等级依次递降。在明清时期，对大多数中国家庭而言，对科举的重视，可以说是超过了任何前代。当时的很多家庭，很早就开始对家中的幼童进行儒家文化的启蒙教育培养，为日后的科举考试做准备。从明代起，商家子弟也首次被允许参加科举考试，他们认识到通过科举的渠道不仅可以提高文化层次和社会地位，而且可以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以及更多的财富。

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既符合当时封建国家的利益，又是儒家文化价值的集中体现。科举考试产生了皇帝钦定的课程，这一课程包括：共同的儒家经典语言和共有的儒家经典记忆，以及“八股文”的文体格式。为了应试，士人必须长期吸收和领悟封建的正统思想、情趣与行为。从而造就了大批的“文人”，并且导致了“士人文化”的产生。这样，文人所需的刻本书籍和文房用品等产业也随之而兴。南京作为明清时期我国南方以至全国的科举文化中心之一，是南方文人的主要集中地点。当时的南京不仅是全国雕版印刷业的中心，拥有来自安徽徽州和福建建阳等地前来的熟练刻版工人，而且又是江南出产的宣纸、湖笔、徽墨、歙砚、青田印章石料和素绢等文房用品的集散地。当时在南京雕印出版的书籍，除科举必备的儒家经书、程文墨卷（即应试者参考用的范文）以至各种诗文集外，还出版有大量带版刻插图的戏曲和小说等通俗读物。明末药物学家李时珍的名著《本草纲目》和清初文学家吴敬梓的名著《儒林外史》，都是在南京雕印出版的。此外，与“士人文化”密切相关的书画行业也很发达，经营性的画寓、裱画、古今字帖和刻字镌碑等店肆均很盛。明末的版刻家胡正言费10年之功与工匠们用彩色套印的技术印成了著名的《十竹斋画谱》和《十竹斋笺谱》，清初文人王概和李渔等也在南京用彩色套印法出版了流行更广的《芥子园画谱》。当时，南京贡院所在的夫子庙及其附近的三山街一带，各种书坊、画寓和文房用品的店肆林立，销售量很大，影响

极广。

在明代，科举制度一直在中国政府和社会中占据着中心的地位。由于南方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优势，南方的考生在科举考试中比那些来自北方、西北以及西南等欠发达地区的考生表现得更出色。为了将南方的科举优势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明代的教育官员们于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设定进士配额，南北方的比例为三与二之比。一年之后又作了一次微调，增加了一些中部地区的名额，而南北方所占的比例则略有减少，这个比例一直沿用到清代。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中央政权控制的松弛和城市化的发展，官宦、地主、商贾家庭出身的士子们的生活开始趋向奢靡。因科举的兴盛，南方各地士子往来云集于南京城南的夫子庙一带和贡院附近的“十里秦淮”两岸地区。这一地区本来就是南唐宋元以来，金陵的手工业和商业最发达的区域。科举文化的发展，更加带动了与之相关的各类工商业的日益繁盛，也催生了秦淮河沿岸灯红酒绿、奇技淫巧的异彩纷呈。并且衍生出许多才子佳人的传奇故事，例如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传奇小说《桃花扇》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明朝灭亡之后，清政府仍然沿用了明代的科举考试制度。自道光二十年（1840年）开始，资本主义列强先后发动了多次侵华战争，清政府不断被迫割地赔款。咸丰元年（1851年），国内又爆发了以洪秀全、杨秀清为首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为了应对这些重大事件，清政府于咸丰十年（1860年）不得不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另一方面，由于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极其深厚，就连以拜上帝教为基础的太平天国的革命改革，也仍然只能以“八股文”的形式来实行“开科举士”。但是，随着帝国主义的全面入侵，特别是西方文化的逐渐传播，科举考试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光环，被看作是腐败的教育体制，并且成为晚清有识之士的不断批判和讽刺的对象。晚清光绪帝的短期变法运动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是科举制度，也最终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被废除。

### 三

考察并研究科举制度存废的演变过程，对于认识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制度变化和发展的轨迹有着重要的意义。





015

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发展与科举制度可以说是息息相关。在科举制度的流行时期，知识分子将读书、应试和做官，规划为人生成功的三部曲，参加科举考试是当时社会文人生活的首要内容之一。自隋唐以来，科举以制度化的形式，使儒家文化保持了作为主流文化的一统天下。中国社会历经多次朝代更迭和少数民族统治，但儒学作为主流文化，却没有发生变化。这与持续千余年的科举制度密不可分。但是，和其他传统文化一样，科举文化所形成的深厚的历史积淀也起着正反两方面的作用。科举制度本身存在着某些消极因素，如以“八股文”为考试文体的内容严重脱离实际，束缚着读书人的思想，扼制了人们创造力的发挥，并且落后于时代的潮流。因此，在现代改革派抨击科举的呼声高涨、国内先进力量呼吁“兴学校、废科举”的压力下，清廷也就不得不废止了千余年来一直吸引着广大文人效忠于封建统治的科举制度。

与科举体制延续千余年相呼应的是，古代官学和私学教育的繁荣和昌盛，它们为科举制准备了大量的应试者。科举制鼓励人们进入官学或私学读书，使教育与应试互为依存，养成了中国古代社会上下皆重教育的传统。科举制又强化了教育政治化的倾向，对官私教育都有着强大的制约力量，不断地固化其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及应试规则。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是纲常等级秩序的思想，但在实行科举制度的千余年的封建专制社会中，却沿袭着相对公平和公正的科举制度，并得到当时社会各阶层的认同，这无疑是说明了科举制度在该时期的先进性和合理性。

据有关研究，由于受到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的启发，英国的文官考试制度才得以产生。相对于晚清以来国内人士对科举制的严厉批判，西方的一些学者却对中国的科举制度通过考试手段来选拔人才倍加称颂。西方学者之所以青睐中国的科举制度，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而其核心则是科举制度的相对合理性。

科举制度应该视作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遗产之一，其平等择优的精神具有恒久的价值。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更多的是将其放在封建的政治体制内，与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而忽视了对科举考试制度本身的研究，对科举制度的了解和认识既不够全面，也不够客观。如今，人们已经逐步认识到全面认识科举考试制的